

一、关于铜鼓起源的问题

铜鼓的研究，应该从“起源”开始，但铜鼓的起源问题，长期以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论点。而论者常缺少可靠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，故迄今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。要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，必须兼及两个方面，即：①最早的铜鼓产生于何处；②铜鼓是如何产生出来的。本文拟据建国以来云南考古出土的资料为主，就上列两个方面有关的问题，进行初步的探讨。

（一）铜鼓起源于何处

1. 中国铜鼓是从越南传来的吗

对于这个问题，越南的考古学界以及历史学界的一部分同行，的确表现出很大的兴趣。例如，《越南历史》一书中便肯定了：“铜鼓从越南传播到北方，到达滇池（云南）、蜀地（四川），并向南传播到马来西亚、椰岛之国（印尼）”^[1]。有什么依据呢？据说，1964年在马来西亚的西部海岸，发现两个置于木板上的铜鼓。经过 C_{14} 测定，木板的年代为距今 2435 ± 95 年。此两鼓的形制是，鼓面有12芒星形，周围有4只飞鸟，化装人形已经变调，略似旂旗纹。据此，《越南历史》的作者便认为：“越南的玉缕、黄贺铜鼓的年代就更早些”。

所谓铜鼓自南而北，从越南传入中国的论据，仅止于此。虽然只有这么一点内容，但其中却充满着混乱和矛盾，如：

（1）马来西亚西部海岸所出之两鼓，上揭书的作者也认为“属于第一类型晚期的文物”。在分类上，笔者称之为Ⅰ型c式，其年代上限大致与“官渡鼓”相近，即不会早于公元1世纪^[2]。离开铜鼓的实际年代，轻率地把它和木板的 C_{14} 数据等同起来，不能认为是严肃的治学态度。何况，据（越）陶维英教授的观点：“玉缕铜鼓以及其他一类型铜鼓是与东山铜器同一时期”^[3]。关于东山文化的年代，历来颇多不同意见，但据微丘遗址（在河西省，属于东山文化）的 C_{14} 测定，为距今 2350 ± 100 年。如果都按 C_{14} 数据，则东山文化的年代，反而晚于马来西亚放铜鼓的木板。那么，玉缕铜鼓不是要

晚于马来西亚鼓吗？由此，可见 C₄₄ 数据也应慎重对待。

(2) 不过从形制的比较上看，玉缕、黄贺两鼓（I b 式），确实比马来西亚两鼓要早些。可是，广西、贵州、四川、特别是云南，出土的 I b 式铜鼓亦多，所有这些铜鼓当然也应该早于马来西亚鼓。为什么不让越南的 I b 式鼓和中国的同式鼓进行直接比较，而要通过马来西亚鼓的比较，得出间接的推论呢？这多少有点厚此薄彼和避实就虚的嫌疑罢！

(3) 要是以实物直接进行比较，那么就不难看出，江川、晋宁有一些出土的铜鼓，可能早于玉缕、黄贺鼓。特别是楚雄、祥云、弥渡、昌宁等地，还出土过一些 I 型 a 式铜鼓，那就更早于越南的“东山铜鼓”了。

由此，可知“玉缕、黄贺鼓更早”，以及铜鼓由越南传入中国的说法，缺少可信的根据。笔者认为：要探索铜鼓的起源问题，首先要找到铜鼓的最初形式。

2. 最初的铜鼓是什么样子

要指出哪一面铜鼓的年代最早，可能是困难的事。但从形制的比较中，认识哪种形制的铜鼓最早，则是可以做到的。

在我国现存的 1400 多面铜鼓中，I a 式的数量最少，它是第一类型中最古的一种形式。过去尚未有综合的报导，现将其发现的经过作一简单的介绍：

(1) 50 年代初期，云南省博物馆于金属回收机构中，采集到此式鼓一面。该鼓形制古拙，为以前所未曾见。《云南省博物馆馆藏铜鼓图录》中，刊有此鼓照片及墨拓，并指出：“整个鼓的作风显得非常原始，很可能是甲式鼓中最早的一种形式”^[5]。

(2) 1961 年在楚雄县东北境，距县城约 30 千米的大海波，因修小型电站，于河沙层中挖出铜鼓一面。伴出物有青铜剑，这是云南首次出土之 I a 式铜鼓。

(3) 1964 年，祥云县东南，距县城 50 千米之大波那，发现了一座木椁铜棺墓，清理出青铜器 50 多件，品类计有生产工具、兵器、炊具、乐器、模型和饰物等。其中有铜鼓一面，鼓面饰有一个 4 芒光体。共存物中还有一件敞口，鼓腹、小平底的铜釜，其形制与铜鼓颇多相似之点。所以《清理报告》指出：“过去对于铜鼓来源于何物，颇多揣测，迄无定论，此式釜之出现，又增添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”^[5]。

(4) 1973 年，在距离昌宁县城约 20 千米的八甲大山，又挖出一个埋藏的铜鼓。出土时倒置，无共存物。此鼓鼓面虽有微微浮起的圆形光体，但无光芒，腰部分为 12 格，别无其他纹饰，也属 I a 式。

(5) 1975年，在楚雄县城东南3.5千米之万家坝，发现一古代墓群。试掘时于M1之腰坑中，出土Ia式铜鼓一面。共存物有青铜器110件。内计编钟一套，6件，其形制与广西西林、贵县等处古墓所出的“羊角形耳铜钟”相似；铜釜3件，其中1件系由铜鼓改制而成的（图1—1）；另外，还有生产工具28套，每套由条形锄、方形锄、铜斧各1件组成。此鼓形制与昌宁鼓相同。

(6) 1976年，万家坝古墓群正式发掘，又于M23棺底垫木之下，出土了铜鼓4面。其形制略同于M1所出者，唯纹饰稍多——光体为8芒至18芒不等，腰部分格最多为16格，下端有横排的回纹，其中3面内壁近脚处，饰有网纹之类。出土时均为倒置，鼓面有烟炱。共存青铜器多达557件，以兵器为主^[6]。

(7) 1978年，弥渡县苴力公社三岔路生产队农民，劳动时于土中挖出铜鼓1面，无共存物。其形制与楚雄万家坝M23出土者相近，但体积较小，重仅9千克。出土时也倒置，鼓里装满黑水。

(8) 1979年，弥渡县苴力公社青石湾村的儿童，在该村背后之山坡上放羊时，发现1面已露出地表之铜鼓。此鼓形制略同上鼓而稍大。

此外，云南文物店先后在昆明市废铜仓库中，检选得了a式鼓2件，其来源不详。此2鼓一为素地（图1—2），1面纹饰和造型均甚奇特，可能是较晚之作。

以上凡13鼓，除弥渡出土2鼓，分别存于弥渡县文化馆及大理州文化馆之外，其他9面藏于云南省博物馆，2面存于云南文物店。

通过实测和观察。Ia式鼓的特征是：身为明显的三截，面小而胴部膨出，中腰缩入特甚，足短而微扩。鼓面多数有光体，有的无芒，有芒者数量也不稳定。腰有分格，其下端常饰以回纹。总的说来，形制简朴，使用的纹样也颇少。其样式与滇池地区之Ib式鼓大同小异，属于同一类型；但由于时间先后和空间分布的不同，两者也有若干差别，如：

(1) Ia式鼓胴部大点（直径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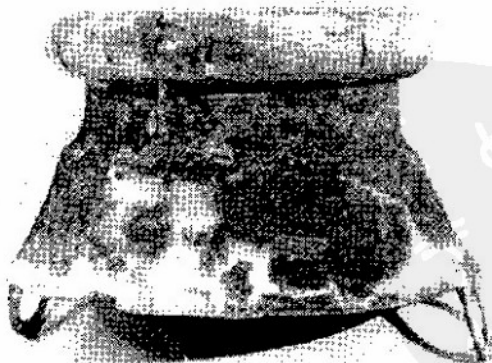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—1 万家坝M1:1号，用铜鼓改制的铜釜

最宽处)偏低,通体最宽处常在足部;I b式胴部大点偏高,通体最宽处一般在胴部之上端。

(2) I a式鼓耳小,无纹饰;I b式鼓耳较大,并常以绳辫纹为饰,后期有的耳之中间,开长方形口。

(3) I a式鼓作风古朴,胴、足部均为空白,腰部分格之内也未有其他纹饰,但有的鼓里施以纹饰^[7];I b式鼓技巧日形娴熟,已进入炉火纯青之境,鼓面及胴、腰两部均有丰富之纹饰,但从未见于内壁施以装饰者。

(4) 万家坝之I a式鼓,出土时均为倒置(图1—3),鼓面有烟炱;滇池地区出土之I b式鼓,在墓葬中虽有多种再生利用方法,但从未见有烟炱者。

据此四端,可知两者虽属一型,但应分为两式。I a式早于I b式,后者系由前者蜕变而来的。换言之,楚雄、弥渡、祥云、昌宁……诸鼓,其相对年代早于江川、晋宁、会理、赫章等诸鼓,而曲靖鼓(详见后)则界于两者之间。至于越南的玉缕、黄贺鼓,晕圈多而纹饰繁缛,鼓腰直段分格之内。已有分成上下两半者,与西林、开化(即今文山,此鼓已流失于国外)、广南诸鼓之时代相近,而会理鼓则较此诸鼓稍早,因为会理鼓腰部之分格虽然分为上下两半,但其纹饰较简略。所以玉缕、黄贺鼓乃I 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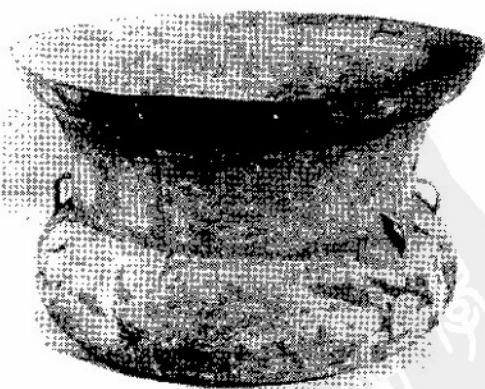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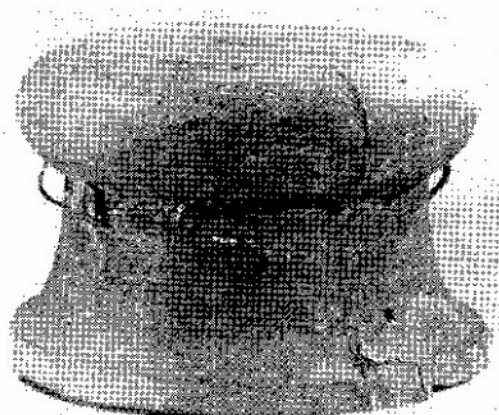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—2 I a式铜鼓的形制(云南文物商店藏)

图1—3 倒置的I a式铜鼓(万家坝 M1:12号)

式中后期之作，其时代并非最早。

总的说来，Ⅰa式鼓发现的数量，占我国现存铜鼓总数的百分比不大，未曾有传世使用者。其分布情况，在各式铜鼓中范围较小，而且出有此式鼓之墓葬，其年代最古。铸造工艺、合金成分、造型纹饰诸方面也最为原始。因此，Ⅰa式鼓是迄今已发现的铜鼓中最古老的一种形式。研究铜鼓起源的问题，应该从它开始。

3. 铜鼓最先出现于何时何地

云南出土Ⅰa式铜鼓的墓葬，共有5个C₁₄测定数据^[8]。参考测定的数据，再结合墓制、葬具、共存物及其他有关的考古材料的综合判断：出有Ⅰa式鼓的墓葬，其时代跨距，约在公元前7世纪至4世纪之间，相当中原地区的春秋中后期至战国前期。

但铜鼓是一种世代相传、长期使用的“重器”，一般不会铸造后即埋入土中，故最先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时间，可能早于墓葬的年代。不过要肯定最初铸造铜鼓的绝对年代还是困难的。现在只能根据如下的一些历史事实，进行可能的推论：

(1) 滇西最早的青铜器，发现于剑川海门口村，遗址的时代距今3100多年^[9]。而滇池地区古代青铜文化的文化水平，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上看，都比滇西先进，因此开始使用铜器的时间，似应早于海门口遗址。如果再从原料来源、工艺条件等因素考虑，滇中、滇东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，开始铸造铜鼓是可能的。

(2) 江川Ⅰb式鼓是出土于“一类墓”中。一类墓的年代上限，有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或稍后^[10]。而万家坝墓群所出之铜鼓及其共存之青铜器，较李家山的同类物要粗糙得多，其年代当然要早于李家山。尽管两处的C₁₄测定数据相距不太远，但考虑到Ⅰa式鼓后期与Ⅰb式有平行存在的情况，故Ⅰa式鼓之时代上限，或可接近公元前7世纪。大致说来，铜鼓形成的时间，约当内地的春秋中期。

至于铜鼓的发源地，当然是和Ⅰa式鼓的出土地点一致。已知的Ⅰa式鼓的出土地点，有10面在楚雄、弥渡、祥云、昌宁。此4县互相连接，在地图上可以联成一个三角形。在此三角形地带中，楚雄共出6面，近总数的三分之二，显然是Ⅰa式铜鼓最集中的地点。故铜鼓可能先在楚雄附近出现，然后向周围扩散出去。

但是，也有的同志认为铜鼓起源的地点，在“西到澜沧江，北至大渡河，东至广西柳江、黔江和贵州鸭池河、北盘江，南至元江流域^[11]”，划了一个很大的范围，包括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四省（区）。虽略嫌其失之笼统，但为慎重计，仍不妨讨论一下：



(1) 西面澜沧江一带，除昌宁鼓之外，仅云县发现过一个Ⅰb式鼓。昌宁鼓虽是早期形式，但从出土情况判断，很可能是经过长期使用的，入土时间未必很早。它是埋藏的（埋藏坑无共存物），所以不能排除它是从楚雄辗转传来的可能。因为，此鼓与万家坝 M1:12 的形制完全相同，尺寸大小也颇相近；铜鼓用毕复埋于土中，是一种较为晚见的现象。

(2) 北面大渡河两岸，恐非铜鼓滥觞之地，因为，四川铜鼓集中于川南一带，而且多是晚期之作，稍早的，只有会理罗罗冲出土一鼓^[12]，也非早期形式，故殊难视为铜鼓始创之地。

(3) 东面，贵州虽是铜鼓分布密集的省份之一，但迄今尚未发现过Ⅰa式铜鼓。赫章所出之Ⅰb式鼓，与滇池地区略有区别，其年代不会早于西汉。至于广西，尽管是现存铜鼓最多的地区，但是，如果不把通体云雷纹的“大铜鼓”，当作最早的形式，那么也就无法证明柳江、黔江流域可能是铜鼓的发源之处。

(4) 南面元江流域，仅在金平县采集到一面传世使用的Ⅰb铜鼓，系 50 年代从一黄姓家中流散出来的。凭这一点，似乎不能和“铜鼓的故乡”相联系。

排除了上述的可能性，范围便可缩小到楚雄、昆明、曲靖这一线了。在昆明市确曾采集到几面早期铜鼓（其中两面是晚期之作），但由于来源不明，无法肯定它们是否出于昆明附近。不过晋宁出土的铜鼓，也有一种形式古拙的“齿纹铜鼓”；又如 M24:24 一鼓，通体素地，如果不是鼓面“穿孔”，它和大波那鼓是颇为相似的。而且，云南省博物馆在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中，曾挖出过一个铜鼓，其形制是介于楚雄与晋宁之间，所以不能排除在晋宁、曲靖这些地方有铸造早期铜鼓的可能。最低限度，也不能否认楚雄Ⅰa式鼓的影响，波及到滇东地区。

简言之，据现有的考古材料看，早期铜鼓的产地，似乎在楚雄一带，西面有的流传到昌宁或腾冲，东面它的影响达到滇东。总之，铜鼓的发源地在云南境内的中部偏西地区，并不存在越南学者所说的：“铜鼓从越南传播到北方，到达滇池”的事实。

4. 谁是铜鼓最早的铸造者

铜鼓最初是什么人创制出来的，这个问题在几百年来，颇多臆断，其致误的根本原因，在于离开了早期铜鼓的发源地。换言之，早期铜鼓产地之古代居民，也就是铜鼓的创造者。因此，本节主要的任务，是解决早期铜鼓产地居民的族属问题，即春秋战国时期，楚雄、晋宁、曲靖一带的居民属何族系。

西南地区的古代居民，《汉书》上的记载是：“南夷君长以十数，夜郎最大；其西，

靡莫之属以十数，滇最大；自滇以北，君长以十数，邛都最大——此皆椎髻、耕田，有邑聚”。夜郎集团的地望在今黔南，并及滇桂边之部分地区。其西的“靡莫之属”，如定在今曲靖及晋宁以西一线，则和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：“……滇池，地方三百里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”的说法吻合。不过，这里所谓肥饶数千里的平地，不仅指“滇国”的范围，还包括所有靡莫的境界在内，因同书复有：“滇王者，其众数万人，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，皆同姓相扶”。滇池是西汉益州郡的郡治，也即“滇国”的政治经济中心，这是已从石寨山古墓“滇王之印”的出土而被证实。滇池即今晋宁。那么，与滇王同姓的劳浸靡莫，便应该在晋宁的东北面了。有人认为它在嵩明、寻甸一带，方向虽然不错，但尚少考古依据足资证明。1964年，曲靖县三宝公社曾发现过一些滇式青铜器——斧、无胡戈、扣饰等。其后，珠街三元大队古墓地，又不断发现类似的器物。1977年冬，云南省博物馆对珠街八塔台墓地进行试掘，于M1出土了陶器4件，铜釜、铜鼓各1件（此墓早期被盗）^[13]。除开铜釜与铜鼓共存这一现象之外，铜鼓的纹饰也很值得注意——鼓面除光体之外，还有“鼉纹”。显然与万家坝鼓有密切之持续关系（它的发现，补充了从万家坝到石寨山之间的环缺）。八塔台墓地之文化面貌与滇文化相似，而方位又恰在晋宁东北，故使人相信它是滇王近亲部落的墓地。其中一些大墓的死者，应是“邑君”之类的人物。也即是说劳浸靡莫的地位，定在曲靖一带，较定在嵩明、寻甸更合乎实际。

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中，称滇人为“滇濮”，与夜郎、句町等并列。所谓滇濮者，即滇池地区之濮人，属百濮系统，而劳浸靡莫既与滇王同姓，并有血缘的联盟关系，因此劳浸靡莫也应该是百濮族群的成员，剩下来的只有楚雄古代居民的族属问题了。

楚雄彝族自治州，是云南省彝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，但彝族进入楚雄的时间并不很早。清咸丰五年（1875年），南华县发现了一份杞姓“罗罗拔”（彝族）的宗谱，凡39世，皆行父子连名制。据这份宗谱的记载，他们的祖先在唐代初年，才从今大理州境的弥渡迁入南华、楚雄。稍后，在弥渡县，又发现另一份杞姓宗谱，与前谱同宗，系于第22世时才分支出来，先迁至南华，然后搬到赵州（今弥渡境），终于定居在哀牢山区的黑摩宜^[14]。从宗谱中，我们还知道杞姓的第二代傍加独，即南诏王细奴逻，第五代皮撒寂是台登郡王慎罗皮的儿子，也就是云南王皮罗阁的哥哥。

彝族不仅迁入楚雄地区的时间较晚，而且父子连名、死后火葬、不用陶器。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使用铜鼓的部族迥然不同——既不纹身，又不居住于栏建筑，更没有猎首、竞渡、衣着尾等习俗。因此，彝族及其先民，不是楚雄的土著居民，他们是后来

者。除开彝族之外，人口较多的回族、汉族……也是外地迁来的。可能在元代以后，楚雄的土著居民便日渐为外来者所代替，到了清代，已经出现了师荔扉所说的情况：“何处能寻土著人”了。

那么，楚雄的古代居民到底属何族系呢？据《康熙楚雄府志》云：楚雄“周为百濮之地”。这虽然是依据传说而来，未足深信；但是，现在的楚雄南诏时是安州的威楚县，它西北面的镇南州（今南华县），昔为濮落蛮所居；东面的南安州（今广通一带），到了唐代才被黑彝所据；北面的定远县，唐武德四年置为西濮州，后没于彝；西面的定边县（今南涧），唐为濮落蛮所居，元末才为彝帅所据。从方志的记载看来，彝族进入楚雄之前，土著的居民主要是“濮落蛮”，落音与僚（读佬）近，故即属于百濮系统的濮僚。这一点和彝族的历史传说颇为合符，因为《西南彝志》^[15]上说，彝族的祖先迁入滇、黔时，当地的土著居民是濮人。

另外，礼社江古代叫做濮水，是以濮人而得名，因系水名故又写作“濮”^[16]。礼社江发源于梁王山，自祥云南流而为百花溪，东南折至弥渡西北境，南入巍山，复南流，合元江而出国境。我们已知祥云、弥渡均出土过Ⅰa式铜鼓，而此两县又处于濮水上源。濮水又因濮人而得名，所以不能不把早期铜鼓的主人和濮人联系起来。濮人之濮，本作僕。濮甲骨文为象形兼会意，此字从“平”，即“辛”而非“辛”。平即曲刀，也称为削。平下之“囟”为人头，曲刀施于人头之上，为黥面之意，即以削刀黥面，而使之成为奴隶。故此人双手捧缶，缶中盛物。但此人有“尾”，这又是因为濮人有“衣着尾”的风俗，所以被称为“尾濮”。衣着尾的濮人的图象，不但常见于滇文化遗存之中，而且也颇多见于铜鼓上的纹饰，可见铜鼓与濮人的关系至为密切。

故此，我们认为云南铸造和使用Ⅰa式铜鼓者，应该属于百濮族群。至于昌宁、地近永昌，应该是哀牢人的范围。哀牢人据文献记载，也有“衣着尾”的风俗，而且永昌、顺宁都产“濮竹”……这就使人想到Ⅰa式鼓也许和哀牢夷有关，是否因族源关系而传入昌宁等地。

不过，古代的云南居民，除开以“滇”为首的靡莫之属，滇西还有“雋、昆明”。《汉书》云：“……其外，西自桐师以东，北至叶榆，名雋、昆明，编发，随畜迁徙，亡常处，亡君长”。从出土的文物看来，“滇西类型”和“滇池类型”也有明显的差别。但问题在于楚雄地区介于两者之间，而出土的文物又兼有两种文化类型的特征，所以容易使人踌躇不决。但细审之，我们还是认为铸造早期铜鼓的部族，应该划入百濮族群。其理由有四：

(1) 如果滇西的雋、昆明，确与楚雄一带之铜鼓创造者为同一族系，那么铜鼓传播的主要方向，便应自东而西，即向滇西地区广为播迁。但，以迄今为止的考古出土情况观之，铜鼓蔓延之基本途径却是由西而东，Ia式的中心点在楚雄，Ib式的中心点在滇池地区，Ic式的中心点则在滇桂边境（主要在桂西），即从百濮地区发展到百越地区。

(2) 文献中说雋、昆明的发式特征是“编发”，在滇池地区出土的文物中，常见到这种编发者的图象。这种人是滇人的战败者、俘虏、奴隶，他们的形象从未曾出现于铜鼓之上。相反，铜鼓上出现的人物是椎髻，纹身，衣着尾。另外，祥云铜棺墓中，与铜鼓共存的一个乘骑俑，也是有髻的。可知铜鼓与“椎髻”之民的关系至为密切，而与编发者殊少联系。

(3) 我们已知劳浸靡莫的位置在曲靖。曲靖距离滇池210千米，《史记》说劳浸靡莫在滇池东北不远的地方（“其旁东北”）。而楚雄距离滇池，大致与曲靖相同，当然也可以说成“其旁”，可是《汉书》中提到雋、昆明时，是用“其外”一词，颇有僻远之义。由此可见雋、昆明的位置，距离滇池较远，不应包括楚雄在内。雋、昆明“地方可数千里”，指的应该是自南而北，即自保山以北的大理地区至西昌地区这一广大的活动范围而言。

(4) 滇文化的中心地点是包括今晋宁、昆明、安宁、呈贡、澄江、江川等地，它的东界在曲靖一带。曲靖是东部边境，所以文化现象上便难免要掺入邻近地区的影响。例如，珠街八塔台古墓，除出土了典型的滇式器物之外，还出土三足器（陶鼎）。这种器形从未见于滇文化遗存中，而颇多见于岭南地区；还有一种铜柄铁剑，则与贵州赫章可乐祖家老包出土的同类物相同，可见它与夜郎地区也有文化联系^[17]。据此类推，楚雄古墓之所以出有空首钺、山字格剑等滇西类型的器物，正是因为它们处于滇文化的西界，与雋、昆明接壤的结果。

滇王的近亲部落——劳浸靡莫，其文化遗存还掺有岭南的影响，那么，我们就没有理由因为楚雄的铜鼓创造者，杂有滇西文化因素，而把他们排斥于百濮族群之外。但是，为了和曲靖地区与滇王“同姓相扶”的劳浸靡莫相区别，可以把楚雄等地的铜鼓创造者，称为“靡莫之属”。这样，既和《汉书》：“靡莫之属以十数”的记载一致，也与早期铜鼓的分布情况相符。

(二) 铜鼓是如何产生出来的

上文，我们讨论了有关铜鼓起源地点的问题，下面继续探索铜鼓是怎样产生出来的。

1. 铜鼓源于何物

铜鼓是从什么东西演变出来，这个问题历来颇多不同看法。约而言之，有铎于说、大鼓说、象脚鼓说、炊具却置说四种。现分别简介于下：

(1) 铎于说。首倡此说者当推（清）朱彝尊，他说：“窃思作铎于本以和鼓，度其形也略似”^[18]。仅是出于猜测，查无实据。到了本世纪 50 年代，才有以越南东山（在清化）出土的有钮小铜鼓作为论证，说：“东汉以来在中国南部以及交趾支那半岛盛行的铜鼓，它的形制也是由铎于逐渐发展演化而成。越南清化东山出土的小铜鼓……它应是铎于向铜鼓过渡的中间型”^[19]。但是，东山出土的小铜鼓高仅四厘米，是明器，即铜鼓的模拟品，它的年代要比早期铜鼓晚得多，可见推论未必符合实际（图 1—4）。

(2) 大鼓说。提出此假设的戈露布（V. Goloubew），是由于看到越南少数民族中，有使用一种置于笼形藤台之上大鼓，而产生此种联想。唯大鼓敲击时系平置，而铜鼓使用时是横悬，情形是绝不相同的；至于说铜鼓之鼓耳，是把胴部和鼓腰连接起来的说法，则更是纯属虚构。但最重要的是，藤台上之大鼓，乃现代使用之物，难免有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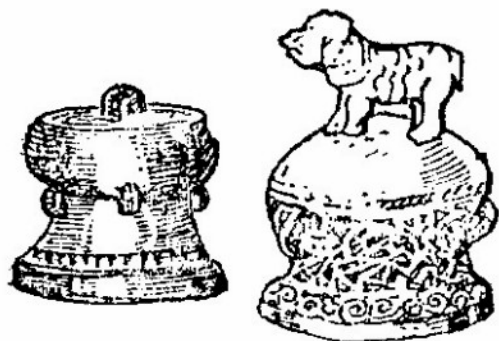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4 越南出土的小铜鼓和鼓形器（明器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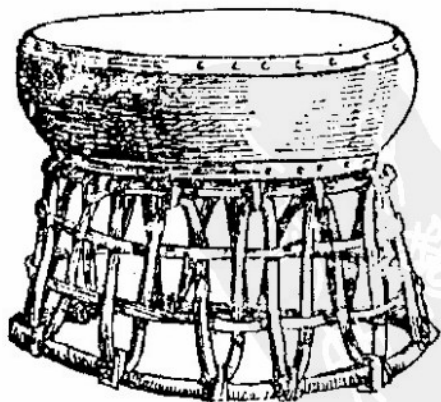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5 越南少数民族使用的大鼓和藤台

今类古之嫌，所以有的日本学者反而认为，以藤台置鼓恐为铜鼓之遗制^[20]（图1—5）。

到了50年代，日本学者冈崎敬氏又重申此说，其新的论据是：“石寨山古墓中出土的铜笙和铜笛，是按照笙和笛的形象仿制而成的，铜鼓无疑是按照大鼓的样式，具体仿制的”^[21]。论据似乎尚欠充分，因为：①最早的铜鼓在万家坝出土时，并未出过铜笙、铜笛，此两者比铜鼓晚出，故不能类推；②所谓“大鼓的样式”，如系指越南那种置于藤台上的大鼓，则我国绝无此制，如指的是我国出土的古代皮鼓，则其形制与铜鼓相去甚远^[22]。所以仍难成为定论。

（3）象脚鼓说。是一种新的创见^[23]，其立论也是从器形的比较中得出的，据说：“早期铜鼓的基本特点，如鼓身上粗中细，足部外侈，在象脚鼓中均能找到”。早期铜鼓的特征，在这里被简化为：两头粗，中间细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。准确的描述早期铜鼓的结构，应该是：面小于底，胴部膨出，中腰缩入，脚微外扩，整体分为明显的三截。而象脚鼓则是鼓面大于鼓身，中腰修长，至脚部突然外扩，整体无明显的界限。一眼望去，铜鼓像倒置的铜釜，而象脚鼓则类似高脚的酒杯，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（图1—6）。

至于早期铜鼓的装饰，是否可以从原始木鼓上找到它的来源呢？这也要让事实来说话。大凡认真看过Ia式铜鼓的人，都会看见：它的胴部和鼓耳，还未有纹饰。所以说耳饰是“背负原始木鼓的绳索所演变”，以及胴部的横晕“脱胎于原始木鼓绑扎鼓面的横带”云云，都是凭想象而来的。再者，早期铜鼓腰部的分格，据笔者统计，共有四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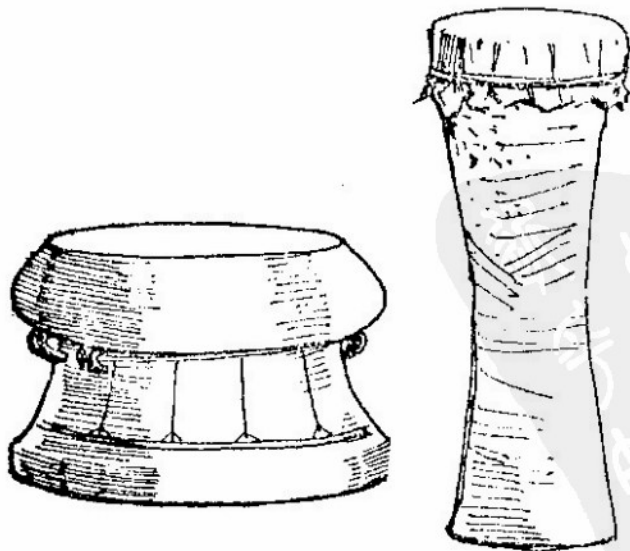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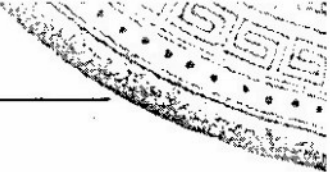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—6 铜鼓与新几内亚原始木鼓的比较



形式，也颇不容易看出它们是如何“脱胎于原始木鼓腰部二系的绳”^[24]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铜鼓的形状和纹饰，和象脚鼓是异多而同少，这种类比说明不了问题。何况，所谓原始的新几内亚木鼓，空间上距离云南过于遥远，时间上又无法证明它们的历史早于铜鼓。因此，象脚鼓说也未有可靠的证据，足以支持作者的论点。

(4) 炊具却置说。据《蜀中广记》引《游梁杂记》云：“诸葛亮鼓其形圆，上宽而中束，下则敞口，大约若今楂斗之倒置也”；又引《戎州记》云：“铜鼓旁范八挂及四蟾蜍，状似覆盆”。可见我国的学者，很早就注意铜鼓的形状，似却置的炊具或容器。在国外近代学者，也有人把铜鼓视作倒放的炊具，不过到了1948年，米维（P. Levy）在他著作的论文《第一式铜鼓的渊源》中，才正式提出了“炊具却置说”。可惜，他未曾提出充足的论据，来证实他的论点。1974年，冯汉骥先生在《云南晋宁铜鼓研究》中，亦持此说，论之颇详（《文物》1974年1期）。尽管反对此说者也从未否认铜鼓与铜釜之相似，但问题仍有待进一步之讨论。

2. 铜鼓与铜釜有何关系

关于铜鼓与铜釜之关系，是由近20年来新的考古现象引起的联想，而结论之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颇长的过程。50年代云南省博物馆在废铜检选中，采集到一面早期铜鼓时，开始引起我们对黑格尔（F. Heger）分类法的怀疑，故曾设想：在黑氏所谓最早的“Ⅰ型铜鼓”之中，应有一种更早的形式。60年代楚雄大海波，第一次从土中获得一面通体无纹饰的铜鼓，后来笔者进行实测时，发现该鼓之入库卡片上有两次更改——先定为鼓，又改为釜，复再改为鼓。估计是因为该鼓胴部两端各开有小孔，不可能作炊爨之用，所以才定为鼓。及后，祥云大波那铜棺墓中，更有铜釜与铜鼓共存的情况，甚至还发表了一幅将铜釜倒置的照片^[25]。70年代，楚雄万家坝古墓群中，则有更多的现象表明铜鼓与铜釜之间，确有联系。

但是，两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，在认识上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。有一种意见认为：“由于铜鼓必要时可以用来煮物，故煮物之釜锅可以模仿铜鼓之形制。很可能云南青铜器中那种与铜鼓形似的宽唇铜釜，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”^[26]。

所谓宽唇铜釜，是一种鼓腹、敞口，小平底（或圈底）的釜。此式釜出土地点计有：云南祥云大波那、楚雄万家坝、晋宁石寨山、呈贡天子庙、曲靖八塔台以及贵州赫章等地。另外，此式釜不仅有铜铸的，还有陶制的，如晋宁石寨山、昆明郊区小板桥等处，就出土过此式陶釜^[27]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式釜使用时间颇长，从春秋战国而至西汉，其形制未有何变化；可是，在此期间铜鼓的纹饰和造型，则在不断发展之中。

故使人怀疑厚唇铜釜乃模拟铜鼓而制造的说法，其理由是：

(1) 云南古代墓葬中，除曲靖一例之外，未出鼎类，故此式釜使用时，必置于三块石头之上（即“锅庄石”），才能烧火煮物。敞口、鼓腹、小平底的形制，正是根据便于容物，并适应架设于锅庄石上而制成的。即使是曲靖八塔台的陶鼎，如去其三脚，也还是一个滇式的陶釜，可见此种釜是适应炊爨功能而创造的，完全没有去模仿铜鼓的必要。

(2) 此式釜既有陶制的，那么就应先有陶制，然后才有铜铸的可能。换言之，此式釜的样式是长期存在的，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创造出来。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，便根本不存在它去模仿铜鼓的可能性。

和上述的情况相反，铜鼓在开始时很像铜釜，后来越变越不像了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因为，它开头时的鼓面太小，和乐器的要求不尽适应。《考工记图》上说：“鼓大而短，则其声疾而短闻；鼓小而长，则其声舒而远闻”。可见鼓面与鼓身的长宽比例与音响效果有关。这虽是指一般皮鼓而言，但铜鼓也是很重视音响效果的^[28]。作为鼓类，鼓面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振动幅度和共鸣效果，所以要有一个较大的鼓面和腹腔。而铜鼓的演变规律，首先便是鼓面不断扩大。这个规律，实际上就是把铜釜的小平底，扩大而成鼓面。铜鼓演变的另一规律，是腰曲渐减。铜鼓的腰曲，本来是釜的敞口、鼓腹所遗留下来的。对于炊具来说，它是必不可少的，但对于乐器来说，则无此必要。

由此可知，早期铜鼓造型上的演变规律，是在改变祖型的遗制，使其更能适应鼓的要求而产生出来的。面对这样的事实，我们便不能不考虑：铜鼓是在改造一种“器皿”，而逐渐形成自己的形制的。而这种“器皿”，形式最相似的又莫过于敞口而鼓腹的釜。这种设想，也许比铜釜模仿铜鼓的说法更为合理。

3. 铜鼓在何种条件下产生

音乐起源于劳动。乐器是从改造和加强劳动工具或器皿的音响效果开始的。普列汉诺夫说：“生产者简单地敲击自己劳动对象的工具，一定比其他都更早地经历这种变化。大家都知道鼓在原始民族那里非常普遍，而且在某些民族那里，至今仍然是唯一的乐器”^[29]。在原始社会里，生产时人们常常用音乐去协调劳动，加强协作；在狩猎或战斗时还要先举行虚拟性的演习——采用歌舞的形式；在休息时往往通过文娱活动以重温劳动后胜利的喜悦……在这些活动中，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敲击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，发生有节奏的音响，作为歌舞的伴奏。后来，当人们敲击的是一个“中空无底”



的东西时，便出现了“虚其腹以振荡空灵而八音起”^[30]的局面。

从理论上说，鼓和其他的打击乐器一样，是产生得很早的。在民俗学资料中，可以看到舂堂杵歌，到剡木为鼓的事实；从文献记载上则有：“蕢桴而土鼓，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（《礼运》）”，以及“土鼓、苇箛，伊耆氏之乐（《明堂位》）”等。由此可知，远在新石器时代，便开始使用打击乐器，以至于使用“鼓”。不过，那时所用的鼓，还不是蒙有皮革的大鼓，而只能“剡木为鼓”（类似云南佤族所用的木鼓），或者烧土而成的“土鼓”。

土鼓即缶（音否）。缶在古代的八音中属土，是烧土而成的瓦器，它本来并非乐器。《风俗通》云：“缶者瓦器，所以盛酒浆，秦人鼓之以节歌”。缶形如覆盆，是因为它中虚而善容，外圆而善应，才被反转过来敲击的。古代所谓“鼓缶”，可能是泛指击打倒置的陶质容器而言，因为史书上有“扣缶”、“鼓盆”、“击甕”等不同说法^[31]。这就是说，在开始时，只要是中空无底，音响较好的器皿，都可以兼作乐器，扣击而节歌。缶被列入“雅乐”之中，是后来的事，至于在乐书中有时也把缶称为“胡乐”，则是由于它曾长期盛行在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中，故云：“古者西戎，以缶为乐，党项因亦击缶焉”^[32]。党项是氏羌的一支，在未迁往宁夏以前，居住在今青海东部和四川西北部，历来与西南地区的民族，有一定的文化联系。党项羌的一支后来建立了“西夏”割据政权。据《晋书·赫连勃勃载记》说，西夏也曾铸造过精美的铜鼓。也许党项羌把古代西戎击缶的传统变成铸造铜鼓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猜测，因为我们还弄不清楚西夏铜鼓，是他们自己创造的，还是受到西南地区的影响。

至于云南，虽然出土过形制近似铜鼓的陶釜，但未有证据可以说明它是否充当过土鼓。不过，云南的古代居民——靡莫之属，是以能歌善舞而著称的。在出土的青铜器中，大量存在歌舞的图象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因此，不可能设想在新石器时代，云南的土著却不会使用任何打击乐器。如果情况是相反的话，那么便不能排除他们在传统的打击乐器的基础上，去发现铜釜宏亮的音响效果，从而对它加以改造。

反对铜鼓是改造铜釜，使之发展成为铜鼓的人，以少数民族对三脚架和火塘的某些禁忌，而怀疑会发生敲击釜锅的事实。要知道，对锅庄石、三角架、火塘的禁忌，是原始时代火崇拜的残余观念，而与炊具无关。《滇绎》上说：“铜鼓，其用如刁斗，昼烹饪，夜击鸣”，是多少接近事实的。不但古代有刁斗，现代云南的马帮还有“铎锅”，都是一物而两用，和原始时代击缶的情况类似。上文已说过，云南未曾出土过铜鼎，所以釜锅和三脚架是分开的。那么，在使用过程中时时从三脚架上搬下来，特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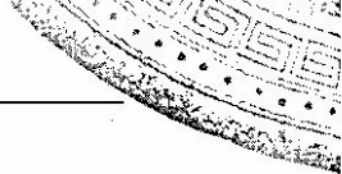
是当釜底积成了一层厚厚的烟炱时，怎样不刮掉它呢？凭这点日常生活的常识，便不难想像古代的人们，在移动铜釜时，怎样去发现它的音响效果——也即是发现它充当乐器的可能性。这是不用什么“天才”的！

原始社会使用打击乐器的传统习惯，和青铜釜可能发出宏亮的音响，两者结合起来，便成为铜鼓出现的基本条件。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则是：由于青铜工具的使用，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，随着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的强化，而产生了奴隶制度下的等级观念。和这种历史条件相适应，也就要求“制礼作乐”以别尊卑。因此，原先用来调节劳动、媚神悦鬼的“伊耆氏之乐”，变成夸示富贵和炫耀权威的铜鼓了。《隋书》和《宋史》上都说：“有鼓者号‘都老’，群情推服”。《明史》上则更有：“得鼓二三，便可僭号称王，击鼓山岭，群蛮毕集”。在西盟佤族自治县的民俗调查中，也看到类似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情况——铜鼓具有象征财富和权威的作用，占有铜鼓越多、越大的人，社会地位就更高，也就不会受到别人的欺侮；在发生争执“说理”时，还有所谓“比牛头”、“比铜鼓”的习惯。事实上，也就是早期阶级社会“以富为雄”的表现。这一点，和考古出土的情况也是一致的；铜鼓都出于奴隶主的墓葬中，而且随葬品十分丰富，以万家坝墓群为例，在发掘的 78 座墓葬中，54 座出有青铜器，共 898 件，而 M1 和 M23 两墓便占有 687 件，即总数 75%，5 面铜鼓也就出土在这两座大墓之内。正因为社会分裂成两个贫富对立的阶级，奴隶主们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，便需要森严的等级制度，而礼乐正是区别尊卑的精神支柱。所以，使用打击乐器的经验积累和青铜釜的音响效果的发现，只是铜鼓产生的可能性，而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，则是靡莫之属的奴隶制度。离开这个社会历史的基础，铜鼓是不可能出现的。

铜鼓是奴隶制度社会的产物，所以它的形成、发展也就要适应社会历史的需要。在奴隶社会的早期阶段，铜鼓经历了一个由釜形到鼓形的时期，即使在它已经扩大了鼓面之后，也还在祀神时兼有炊爨祭品的作用。随着奴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，铜鼓的“礼器”的社会职能更加突出了，于是，在纹饰方面也日趋于华茂。大约在公元前 4 世纪，它便进入了成熟期，建立了完美的形制。

（三）简短的结语

建国以来在云南先后发现一些 I a 式铜鼓，它是迄今考古出土中最早的形式。此式鼓约形成于春秋中后期，秦汉之际即与它的后继形式——I b 式共存于滇池地区。最先



使用这种铜鼓者，是古代百濮族群中的一支，即文献中称为“椎髻、耕田、邑聚、有君长”的靡莫之属。

综合研究表明，铜鼓并非导源于鐙于、大鼓、象脚鼓。铜鼓的早期形制极似炊具。铜鼓是原始时期积累下来的打击乐的经验，和音响宏亮的青铜材质的结合；而云南古代的奴隶社会，则是它产生的必不可少的历史条件。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。不过，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。在我国的内地，适应奴隶制度的需要，是把“鼎食”的鼎变成了礼器。在边疆的“西南夷”地区，没有三脚的鼎，所以把铜釜改造成乐器兼礼器的铜鼓。这就是历史的特殊性，也就是它和中原奴隶主国家的差别。

另外，还得指出：铜鼓虽非雋、昆明所创造，但Ⅰa式铜鼓集中的楚雄一带，其地理位置正好处在靡莫与雋、昆明之间，所以和楚雄出土的文物混合着滇池、滇西两种文化因素一样，铜鼓的产生，也可能包括着西南民族，乃至西北民族的多种文化因素。

把铜鼓当作天才的产物，是错误的；把铜鼓说成某个“优秀”民族的单独创造，又何曾正确？铜鼓的起源问题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，首先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才能接近客观实际。不宜把它和政治问题等同，或者把它从属于某种政治需要。

附 记

李晓岑等先生的新著《中国铅同位素考古·云南早期铜鼓矿料来源》（第三章），主要的结论是：云南早期铜鼓的矿料，来源于滇西至滇中的滇池一带，石寨山鼓的铅同位素分布场与万家坝鼓互相重叠，两者的矿料来源相同或相近，表明石寨山鼓与万家坝鼓有承传关系。所以，铜鼓的外来说毫无依据。铜鼓首创于云南境内，不仅从铅同位素的分析中得到证实，而且从铜鼓纹饰的演变过程中亦得到再度证实。

注 释

- [1]《越南历史》第一集，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，河内：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71年
- [2] 参见拙文《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》，《考古》，1979年第1期
- [3]《越南古代史》中译本第191页，科学出版社，1959年
- [4]《云南省博物馆馆藏铜鼓图录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
- [5]《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》，《考古》，1964年第12期

[6]《云南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,1978年第10期

[7] Ia型鼓内壁有纹饰者,共有四例。三例见于万家坝 M23,一见于弥渡三岔路鼓。鼓里纹饰一般为云纹、网纹、也有于菱形网纹之四角另加并头云纹者。其中楚万 M23:159号鼓之内壁,共有七个纹样,最惹人注意的是一个爬虫状的花纹——原报告称为“四足怪鸟”,但此纹样无翅而有四足,吻短而有扇形尾巴,颇似蜥蜴之属,疑为“鬣纹”。此纹样也见于曲靖八塔台土铜鼓之鼓面。

[8] 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,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。其年代距今 2350 ± 75 年(前 400 ± 75 年)。楚雄万家坝墓群,据北京大学历史系古专业实验室测定 M1 距今 2640 ± 90 年(前 690 ± 90); M23 距今 2350 ± 85 年(前 400 ± 85 年)。又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, M1 距今 2375 ± 80 年(前 425 ± 80 年),树轮校正年代 2400 ± 90 年(前 450 ± 90 年); M23 距今 2405 ± 80 年(前 455 ± 80 年)树轮校正年代 2430 ± 90 年(前 480 ± 90 年)。本文对 C_{14} 数据只作断代参考。

[9] 1956年发现的海门口遗址,是迄今为止滇西发现中最早的铜石并用遗址,在大量石器、陶器、骨器中。夹有小铜器14件,铸造工艺较差,含锡量低。另外,还出有铸造铜钺的石范一件。《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》,《考古通讯》,1958年6期。1978年再次发掘,在文化层的木柱间又出土空首钺一件;在此之前海门口河下游之沙溪公社,农民在鳌峰山采石,也在古墓中发现过类似的钺钱和石范,证明海门口一带的铜器确为本地所铸造的。海门口遗址的年代,据 C_{14} 测定,为距今 3115 年。

[10] 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,江川李家山 M23(一类墓)的年代距今 2500 ± 105 年(前 542 ± 105 年)。树轮校正年代 2653 ± 145 年(前 685 ± 145 年)。这个数据偏早,但李家山早期墓的上限断在战国后期可能是合适的。

[11] 见《试论中国古代铜鼓》,《考古》,1978年;12期;第190页

[12] 见《四川会理出土的一面铜鼓》,《考古》,1977年;3期

[13] 见《云南青铜文化概论》(《思想战线》1979年4期),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范围较大,尚未有正式报导。该处战国至西汉的墓葬所出的文物是属于滇文化类型。

[14] 南华县杞姓宗谱:奢傍——傍加独(即细奴逻)——逻填——慎罗反——反添寂——寂奢奈——奈结武——结武第——武第灼——灼刷舒——舒禄——禄埃——埃尼——尼巴——巴勒丹——勒丹北——北贴布——贴布迭——布迭笃——迭笃费——费柯——柯古——古於塔——塔奢觉——觉格卡——卡度木——木及米——米易博——易博麦——博麦基——麦基德——德曼尔——尔比——比益——益社——社勒——勒整果——整果必——必彩。以上凡三十九世,行父子连名制,以下改为汉名·弥渡县牛街另一杞姓宗谱,是在二十二世之费克(即前谱之费柯)分支,其下为:……克柏——柏署——署害及——害及磨——磨特幸——幸济约——约列凄——列凄把——把也——也革——革达——达也——也阿万——万灼武——武左——左开。凡卅八世而连名制止。另外,今弥渡西北山中,仍散居有二十多个村子的杞姓“罗罗波”,当系他们的同宗。又据《蛮书》及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等书的记载,南山(今南华县境)为罗罗蛮所居。“罗罗”即彝族,元代以后有此称